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：

追求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

本报记者 陈学慧



- ◇ 此轮经济增长减速是“周期性”、“政策性”，还是“结构性”？
- ◇ 何谓尊重经济规律、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速度？
- 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？



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。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曾五次获得“孙冶方经济科学”著作奖和论文奖。

李扬

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。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曾五次获得“孙冶方经济科学”著作奖和论文奖。

侧记

“全面”的李扬

陈学慧

采访李扬，是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。

当天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组织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。学习结束李扬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独家采访。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，李扬兴致很高，谈到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的理解，十分兴奋。尊重经济规律、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；没有水分、产能过剩；结构性减速、摩擦性失业，李扬逐词解读。

“从经济学上看”，李扬喜欢用这个词，而那些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，被他“掰开揉碎”地讲出来，显得通俗易懂。

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试图从李扬对每个经济问题的回答中不仅学到他的真知灼见，更想学到他“解题”的轨迹、思考问题的方式。

“全面”，李扬这样评价自己。看问题，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偏颇，而是从多个角度，甚至换个角度来审视。

“全面”取决于李扬的学术背景。大学学的是经济学，读硕士研究的是货币金融学，读博士研究的是财政学。这样的知识结构让李扬对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更深的理解和研究，也让李扬能够横跨金融学和财政学两大领域；

“全面”还取决于李扬的学习方式。李扬十分感谢他在复旦大学的导师，已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陈观烈教授。导师不仅给予他在学术道路上的指引，更是教会他要读原著。正是在复旦，他通读了全套凯恩斯理论原著，包括凯恩斯的自传。他还根据导师的要求，到上海财大（现上海财经大学）旁听财政学，在研究生期间已将货币金融学和财政学融汇起来；

“全面”也取决于李扬的勤奋。他曾五次获得“孙冶方经济科学”著作奖和论文奖，已出版专著、译著23部，发表论文400余篇，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。主持国际合作、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。这样的高产让李扬的理论功底更加深厚，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也更加紧密。

采访结束已到中午十二点半，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请教李扬，如城镇化投资问题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、系统性风险问题等。“我现在对里根—撒切尔的供给理论很感兴趣。”临别，李扬又抛出了新题目。

果然是“全面”的李扬，让我们学不胜学啊！

本版编辑 祝惠春
联系邮箱 jrbcbh@126.com

记者：岁末年初，很多研究机构对新的一年经济形势作出研判。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，中国经济在连续7个季度增速放缓之后，第四季度出现转圜。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，有的预测将不超过7%，有的预测在7%到8%之间，也有很乐观地估计在9%以上。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？

李扬：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平均高达9.8%的增长，正在由“结构性增速”进入“结构性减速期”。因此我们判断，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，将进入一个位于8%左右的较前略低的平台上。而且，此轮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性的，更非政策性的，而有着明显的“结构性”特征。

记者：怎么理解结构性减速？

李扬：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，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。相关的结构可以列出很多，其中最重要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。首先，从劳动、资本、技术进步三

大生产要素结构来看。劳动力的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。每年1000多万农民工进城务工，加入劳动大军，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。但是，在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，这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，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。从资本投入来看，人口日趋老龄化、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，将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。随着储蓄率开始下降，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。至于技术进步，我们当然

希望它能发挥积极作用。但是，资本回报率低、技术进步缓慢，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。总之，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，技术进步缓慢，这三个因素叠加，自然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。

其次，从一、二、三次产业结构来看。在过去30年里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：一产比重下降，二产比重迅速提高，三产份额缓慢增长。与此对应的，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。它表现为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，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，由此导致经

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。很清楚，所有这些变化均非周期性的，更不是政策性的，而是经济成长阶段转移使然。这是一个自然的、发生在实体层面的过程。在历史上，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。

记者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势的判断，二者矛盾吗？

李扬：不矛盾。我希望强调的是，我们说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，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，但是，结构性减速更多的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、动力和机遇。抓住这一机遇，我国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、重视质量、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。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，更为真实，从而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真正的福祉。总之，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，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，恰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。

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

多年来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但存在虚高成分，过高的增长成本、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令我们“实在”享受到的增长成果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。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的要点，主要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。

记者：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，明确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、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增长，您对这四个“定语”如何理解？

李扬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，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，我们要的是尊重经济规律、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速度。对速度的这四个“定语”，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，是一个很大的亮点。以前讲“平稳较快”、“又好又快”，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都是“快”。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、效益上，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，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。

尊重经济规律，很多文件里都没有这样强调了，作为经济研究者，读起来十分亲切。强调尊重规律，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变化的因素及其结构，不是拍脑袋，不是根据主观好恶，而是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求得最好的发展结果。要讲求质量和效益。在这里，质量是和数量相对应的，效益是和投入产出相关联的。这意味着，要切实改变求量、求快的粗放型发展模式，

转变到重质量、有内涵的发展，真正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。可持续，意味着我们希望经济平稳发展，避免大起大落。过去我们讲可持续，较多指的是环境的可持续。实际上，可持续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经济学概念，环境的可持续，只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。对经济工作而言，速度过高或过低，并不构成太多的担心，最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剧烈波动，忽上忽下。

记者：您讲到，要把增长中的水分挤出来。有人说挤水分，挤的是统计数据的水分，您认为GDP的水分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李扬：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，存在虚高成分，过高的增长成本、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令“实在”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。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，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水分主要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。常有外国朋友问我，中国的统计数据中的水分有多大？我的回答是，从专业角度看，表现为瞎编数据的“人造水分”已经大规模减少，但是，增长的外延水分、

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。

其一，增长的外延式水分。多年来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。投资在当年是内需，可提高经济增长率，而在来年则会形成供应，需要新的内需去“吸收”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基于这种循环关系，我们要研究两类问题：一是过去的投资是否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，二是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，是否存在更多新增需求来“吸收”这些新增供给？简言之，关键要看投资能不能形成有效供应。如果这些投资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，生产出的产品又都能被消费所吸收，那么，这种增长是无水分的；反之，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，变成“胡子工程”甚至是“豆腐渣工程”，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。进一步，有些投资的确形成了生产能力，但是，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，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，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，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是水分。

其二，增长的内涵水分。我们知道，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庞杂，但从根



漫画 高妍

基本上说，就是探究“最大”和“最小”的关系，展开一点说就是两句话：以最小的投入得到定量的产出；或以定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日子比较好过，GDP增长很快，财政收入更有跳跃性增长，官方外汇储备也达世界第一。于是，在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过程中，我们比较多地强调投入，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，强调增加贷款、减免税收、“给政策”等等，但很少顾及产出，更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。这样造成的结果是，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不快，有些领域，有些时候，甚至有所下降。简言之，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，实际上可以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；或者，依托目前的投入，我们事实上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出。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，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。

其三，生态破坏的水分。过去30

年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，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难以以为继，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破坏。据我院专家测算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%，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降低到4%左右。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，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%左右。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减少了人类的福祉。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。这些折扣也是增长的水分。

我想强调的是，实现尊重经济规律、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增长，就是要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。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只是压缩了水分，这种减速是值得欢迎的。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，这正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，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。

财政货币政策需协调配合

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，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，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，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。财政货币政策应密切配合，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。

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，但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，大有“我死之后，哪管洪水滔天”之势。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，我们要把守住。虽然今年CPI不高，但今后不可小觑。守住CPI，是未来的重点，不要被需求管理所诱惑，要在提高效率、提高质量上作文章，要在创造有效的供给机制上下功夫。

记者：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，间接调控所依托的主要政策手段，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。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是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。您既是中国金融学会的副会长，也是中国财政学会的副会长，请您谈谈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样协调配合，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科学性？

李扬：在最近几次中央有关经济工作会议中，都提到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，在“十二

五”规划纲要中，也有同样的表述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，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，政策效应必须“内洽”，至少应不相矛盾，从而实现“1+1>2”。遗憾的是，迄今为止，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两大政策尚有掣肘的问题存在。

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，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，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。初步想来，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七个方面：其一是政策配合态势。众所周知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所松、紧、中性三种状态。简单地组合，至少可有6种状况，如“松/松”、“松/紧”、“紧/松”等。于是，选择何种组合，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

目标，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，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。如此看来，我们行之十余年“积极+稳健”的提法，就显得过于简单了。其二是国债政策。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，主要是财政政策，但一进入市场，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，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，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。鉴此，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，当属题中应有之义。其三，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。未来，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。同工业化一样，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，但是，由于兼具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，城镇化的资金需要至少有所松、紧、中性三种状态。简单地组合，至少可有6种状况，如“松/松”、“松/紧”、“紧/松”等。于是，选择何种组合，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

使用问题，在我国将越来越重要。各国经验显示，财政全包和完全依赖金融机制，都不可持续；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、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几大“支柱”。这中间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层面可谓“犬牙交错”。其五，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资金联系问题。由于财政资金广泛地存放于央行、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，央行具有经理国库的功能，财政、金融两大部门的资金联系堪称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。因此，确定财政、金融两大部门资金联系的规则，便是一件大事情。其六，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。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，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。在我国，这一问题刚刚破题。其七，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，随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任务日趋复杂和紧迫，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，已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就要求我们形成前瞻、全面、统一、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，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。倘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形成合力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将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。其他的不说，我国近年来在G20峰会及一系列相关会议上的经历，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不协调的弊端了。